

北方交通大学

校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18—20

北方交通大学

校史资料选辑



18

北方交通大学史志编辑室编

校史资料选辑

第十八期

主办单位
北方交通大学
史志编辑室

印刷
北方交通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96年7月

本刊地址
北京市西直门外
北方交通大学
邮政编码 100044
市电:63240401
路电:40401

目 录

校 史 回 忆

- 我的自述——一个简短回忆录的片断…………… 刘炽晶(1)
从府右街到红果园…………… 刘彦邦(4)
60年代在母校学习期间回忆片断 …………… 宋宪龄(5)
在母校过春节 …………… 程训诂(11)
怀念杨增祥同志 …………… 王维国(13)
爱国需先知史 …………… 罗文俊 丁 娜(14)

系 史

- 通信与控制工程系发展简史 …………… 于希江(18)
工业与建筑管理工程系发展简史 …………… 张秋获 李培煊(23)
人文社会科学系简史 …………… 张红薇(25)

人 物 介 绍

- 游泳截获张敬尧运送的鸦片种子积极投入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 罗文俊 丁 娜(28)
北方交大新增博士生导师简介…………… 史志编辑室(31)

校 史 资 料

- 北方交大学科建设、博士后流动站、访问学者概况……………
…………… 张保生(43)
北方交大第七、第八届党代会概况…………… 史志编辑室(57)
北方交通大学校办产业简介…………… 岳兆宏 黄维科(61)

解放后北方交通大学历届工会代表大会概况	史志编辑室(66)
1994、1995 年北方交大新具备正副高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人事处(74)
1994、1995 年我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人事处(75)
1991 至 1995 年北方交大从事教育工作满 30 年的教职工名单	人事处(75)

今日北方交大

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四所交大校领导	校报(77)
交通大学百年校庆庆祝活动隆重举行	校报(79)
北方交大增加二个博士点、五个硕士点	张福喜(80)
“八五”期间我校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简况	科研处(81)
学校简讯	校报(88)
1996 年我校本科招生实行并轨	校报(88)
成人教育学院南京分院成立	校报(88)
我校十五种教材获铁道部第三届优秀教材奖	校报(89)
汪希时教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校报(89)
部分学生为杜锡钰教授从教 56 周年暨 78 岁生日举行纪念会	校报(90)
我校召开 1996 年教学工作会议	校报(91)
我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启动	校报(91)
部分学生的学杂费从 1996 年开始减免	校报(91)
“列车超速防护系统”通过验收和技术审查	校报(92)
我校 1996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金额第一次突破 100 万	校报(92)
王莉、林鸿禧、孙锦华三位老师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校报(92)
简讯数则	校报(93)
1995 年校内十大新闻	校报(93)

校 史 回 忆

我 的 自 述

——一个简短回忆录的片断

刘炽晶

北方交大校史编委会(校志编纂委员会)同志:

兹送去〈我的自述——一个简短回忆录的片断〉初稿一份,这是刘应泉同志传达你刊索取有关我对本校工作的一些史实而写出的。因为我想如以提纲式的来写,项目繁多,恐在编写简略时不易全面地概括进去;因此我用一些时间和精力试着写了这篇回忆录。

如果你们认为可以摘要刊登,就请留待补白,否则希将原稿退回为幸。

顺致

敬礼!

刘炽晶

1986年3月13日

我于1899年农历11月出生于河北省滦县。少年时期曾在家庭私塾里读过五经、四书、唐诗、左传等古书。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曾搞过学生会及学生评议会的工作,也曾发起过天津学生“五四运动”。在南开大学读书系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的。学习期间对国学及社会学颇感兴趣,并曾做过两次社会调查。后来受交通部派遣赴美国学习铁路运输,只曾在铁路上进行过两次调查与学习。这几次的调查均写出过论文在课堂上宣读并获得了好评。在美学完硕士学业并攻读博士学位时,因家庭关系即先期自费从欧洲回国,一直未要求补发路费。(自费自己工读所攒的钱)。

我回国以后,一直在铁道部及铁路上工作。在抗战时期,因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愤而脱离铁路南下,在1941年2月被调任本院教授。

抗战时期,本院在后方贵州省平越县(现福泉县)复课。当时,学校的规模狭小、且系流亡过渡的性质,也根本不可能有所发展。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3月学校派我代表平院来平办理接

收校产并筹备开学事宜。当时我深感责任重大，且人微言轻，况当时学校校址系被国民党军队中势力最强大的空军所占领，后台强硬，前此学校曾委托华北铁路特派员代为接收，既已被拒绝；现在改派我去办理，岂能胜任？经再三推辞不准，只得勉强受命。

我抵平后，首先赴北平行营谒见李宗仁主任，请予协助饬令空军迅速腾让校舍，经即先予照办。随后凡三次赴南苑北平空军司令部及本院原校址——北平空军修理工厂（在市内府右街南口）与郝司令及魏厂长再三交涉，但该司令等却百般借词拖延，并一次携我赴另一被该军所占据的某中学校址，企图以此来与我院校址作交换，当然这一企图被我严词所拒绝。不过在这期间我也曾用过软硬兼施的办法拒理力争（所谓软的办法即设宴款待，硬的办法即以语言来威胁，如：“你们的军队是丘八，我们的学生则是丘九，如果我们的校舍你们长期不予交出，到我们学生要闹出事来，在各地报刊上一登，或是跑到重庆国府去请愿，到那时恐怕你老兄就要下不了台了”）。经过这样几次的周折，他们终于同我商定了分三期把校舍交还的办法，并在商妥的同时，当着魏厂长的面饬令先将宿舍以后的部分腾出交还作为第一步，使学生到校后再分期交还其他部分。第一部分收回以后，即打开了东校门出入，同时也把校名牌悬挂起来了（校名牌系我请铁路老前辈、北平铁路大学校长关赓麟先生所书写）。

除了接收原校舍之外，对于教职工的家属宿舍的准备与否，乃是一项应予考虑的问题。由于我院原先并无员工家属宿舍的设施，我考虑后方教职员家属一旦抵平后无宿舍安置，实属缺憾；且一般正规大学理应备有家属宿舍。因此，这一问题在北平校友会，特别是沈恩涛校友的支持下（沈在当时任平津铁路局副局长），由平津路局拨给石碑胡同原日伪时期“铁路女子中学”校舍一处，由华北电讯总局拨给王府仓宿舍一处。这两处宿舍的房屋皆相当的宽裕。以后由于招收了中技科的学生，即把石碑胡同的宿舍改为中技科的校舍了。

关于以前散失的学校图书，铁路各种模型，招收新生以及准备开学等筹备事宜，则皆系在新院长徐佩琨到校以前所经办的事。

徐佩琨院长到校后，在教学方面曾聘请了一些兼任教师勉强维持上课，对发展学校的工作，似乎做得不多。但是在配合当时北平军警镇压爱国进步学生的革命运动方面，却很卖力气。当时学校各方面都显示出反动气焰非常高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我在当时因对徐的治学方法，持反对的态度，结果竟遭到他视为眼中钉，似非达到整治我的目的不可，于是我的名字就被列入了所谓的“反动黑名单”之内，拟予逮捕。所幸在1948年北平大逮捕学生之前几天，我已经被迫离开了学校改就燕京大学之聘，并在大逮捕燕京大学生时，我虽受到了一些威胁，但因得到了校长及校内的民进负责人严景耀教授的庇护，乃得幸免于难。从此，我也就与民进及其他民主党派有了进一步接触。

北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上半年先在本院任兼课教师，后来军委铁道部即将我调回学校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起初任院委会主任委员，后来在1950年8月改为院长。

我对搞教学行政工作毫无经验，尤其在解放初期，事务繁多、百端待理，且有许多事项属于除旧布新的性质，我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分，担此重任，对于党的领导、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毫无所知，虽然在个人思想上确实想把学校搞好，但在所做所为，资产阶级的种种表现，终难免不影响于学校的工作。现在回忆起来，下列各项皆系当时所经办的：

（一）解放初期，本院大学部的教师已确定有一大部分须予解聘，而当时距离应该开学的期限又迫在眉睫，于是迅速延聘教师即成为当务之急。更由于铁道部为了日后增设学院，必须储备师资，这样，就决定以政治上不反动，在学术上有真才实学者作为聘请教师的标准。从此，就

先后聘请了一些教师。但是,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做很详细的审核。甚至有因某种原因,致使有个别应该聘请的优秀教师未能聘请,而有的似不应聘请者反而聘请了。此外,为了增开新课,还聘请了几位教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兼任教师。

在聘请教师问题上,我一向认为是教学行政的一个重要职责,应以专任教学为主,使之在某一门学科上逐渐成为骨干力量,并在教师队伍中,互相团结合作,以期在教学科研上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在好的校风中占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为正规化大学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正规化的教学制度是搞好教学的必要条件之一。解放以前,我院徒有各系虚名,却无指导教学的实际职能,各系教师各自为政,不能互相配合。诸如课程的设置,师资的配备,教学制度的订立,学生学习与生活思想的情况,等等,皆听任其自由发展,无人过问。因此,针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从解放初期起,就逐步设立了各系科办公室,将一切应归系科处理的问题,即分由各系科主管人员去处理。

(三)接收北平铁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和唐山工学院建筑系三项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不过在接收的方式方法上和原有人员的留用上,尤其是对北平铁路大学的接收方面处理的似嫌过急一些,有许多问题可能从未经审慎考核过、即不了了之,似乎太简单从事了。这种过错我在当时虽刚刚到校未能参与全部过程,但在最后阶段没能制止,就草率加以处理,这与辞退大批教师几乎相同,似也应当分担一部分责任的。

(四)筹建西郊新校舍。由于学校在解放初期发展较快,师生员工人数逐年增加,校舍不敷需用,已成为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在起初铁道部只允许在原校址附近暂时租用民房来解决,俟后决定在校门北面的空地上建一个三层楼的新建校舍,并已画图招标,嗣因中央统战部与铁道部协商愿将我院原校址拨予该部使用,令我院在西郊另建新的校舍,这样前议在北门外建校舍之举即行作罢。于是我院一面商由市政府在西郊拨给供三千学生发展所需用的建校用地(即现校址)并一面即由我院建筑系的教师着手勘察设计新校舍图纸并塑造成一个全校发展的整体模型。在正式施工方面即责由铁道部建筑工程处负责进行。另一方面为了应付临时师生住宿之需,即在原校舍附近租用了几处民房。

(五)派遣留苏学生的工作,乃是提高教学质量必不可少的当务之急。我院系铁路专科学校,所授课程多属冷门,一般来说专习铁路者比较少。为了逐步提高师资教学水平,除在本国学习或延聘外籍教师来校任课外,派遣学生或教师出国进修实有必要。在当时我院争取派遣两批留苏学生即系为了学成,回国后能在我校成为教学的骨干力量。

(六)除了上述几项荦荦大者以外,其他如逐年添购图书及电信系与物理课教学所需用的仪器设备;成立学校医务室;停办俄文专修科;中技科改迁到石家庄新校址上课;学校院利的发行;中央及铁道部首长莅校作报告;以及在1951年8月我提请辞职,等等,皆系这两年所经过的事,应在此一并提出的。

以上种种均系我在解放初期两年的教学行政时间内所经办的事情,现在用回忆录的形式简略地叙述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偶尔闻有非议,则又前怕狼后怕虎,不知既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信任,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然而我却胆小怕事,深恐在我的任期内,对工作有所陨越,愧对党和人民对我的付托与期望,因此,再三向领导提请辞去领导职务仍任教学工作。这就是我所以辞职的原因。

我老矣,以耄耋之年,回忆往事,不禁感慨系之!自恨在业务能力上,因早年相信非学实业

不能救国，一再改行学习，以致学无专长。在实际工作上，虽前后几十年做了一些工作，但贡献殊嫌太小，远远未达到人民对我的要求。而在社会活动上，则以生性憨直，且不谙人情事故，在旧社会早已经受不住长期的刺激，致使神经受到了创伤。对处事为人，诸多失误，悔恨良殷！为了亡羊补牢，只想对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现实态度来加以努力前进。虽然为此，但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斗争及以后十年浩劫，又使我无端遭受了二十余年的不正确的处理，致两腿瘫痪，身败名裂。此情此景，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那堪回首话当年了！

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英明政策重现了光明，全国大好河山又重新繁荣昌盛起来，而我所受的不正确处理也得到了平反。我除了深深感谢党的关怀与照顾之外，明知年事已高，来日甚短，但“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目睹盛世的到来，伴随着全国铁路建设突飞猛进的形势，更回忆我校在平越时期四个班的悲惨情景以与我校现在的规模宏大，师生几近万人者相比之下，真有天壤之别。我不尽老态龙钟，雀跃奋起，随时准备着响应党对老年人的号召，来发挥些须的余热矣。

（此篇所述虽系我个人的回忆，但其中有许多涉及到我校已往的史实，如有需要亦可做为，编写校史的一点参考资料。）

从府右街到红果园

刘彦邦

我是运输系1952年毕业生。在迎接交通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回想起北方交大从府右街迁到红果园的前前后后，有些往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前我校的前身是“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校舍位于府右街南口25号，学校北门在李阁老胡同（现力学胡同）。学校与中南海仅有一路之隔，课余饭后登上学生宿舍楼顶，南海、瀛台等景观可尽收眼底。记得1948年末解放军围困北平时，傍晚站在楼上，可以看到解放军攻城的炮火，学校距天安门、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北京图书馆都很近。学校占地面积只有46.5亩，房屋建筑除办公楼、图书馆和一栋学生宿舍楼之外，其余房舍都很陈旧破乱。1949年3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时，学校设有运输、业务、财务和材料四个系，还有附属中等技术科，校舍在鼓楼东法通寺。全校有专任教员30人，职员44人，工人74人。大学部有学生215人，中技科有学生105人，师生总计468人。另有兼职教员28人。

北方交通大学北京铁道学院于1951年9月从府右街迁出，原有校舍全部交中央统战部接收。当时红果园新校舍尚未建成，大学部暂时迁到平安里石碑胡同，当年招收的新生推迟入学，在校学生到现场实习。我班同学由金士宣教授率领去天津站实习，回京后又参加了“全国铁路展览会”讲解员的工作。展览会结束后，全部展品移到我校，成为运输系教学馆的前身。1951年10月25日新校舍初步建成，学校全部迁入。这学期11月8日方正式上课。

新校园划定土地1500亩，校园又名红果园。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红果园得名的由来。据我所知红果园的得名是因为过去这里有很多红果树。但是这种红果树并非山楂树，它是一种多

年生灌木，每年结有草莓般大小全身有毛的浆果，成熟时变成桔红色，很好看不能食。学校刚刚迁来时，在操场中央的土堆上，在家属宿舍区还有很多株，现在不见了。当时校园附近只有一些散居的农户（据介绍，数年前在幼儿园南有一小村，名红果园），环境比较荒凉，夜幕降临，校园里常有野兔、狐狸出没。

学校由城内迁出时，新校舍建成及在建面积约万余平方米，还没有现在9教学楼建筑面积多。记得当时有办公楼，一、二教学楼，图书馆，一、三、四学生宿舍，东食堂和51区家属宿舍等。现在只有一、二教学楼、图书馆、教学馆及十一楼尚存，其他建筑均已拆除了。

北方交大从府右街到红果园已有45年，在这45年中，北方交大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更快。据了解，现有校园为800亩。从1980年至现在，累计完成建筑面积有18.5万平方米。北方交通大学下设5个学院，13个系，28个专业；有11个博士点，33个硕士点。1995年在校各类学生总数为6832人，教职工2374人。可以预见“211工程”实现后，学校将有更大的变化。我在北方交大工作了一辈子，由一个年青的学生变成了退休老人，北方交大与我息息相关。我为学校的发展壮大而欢呼，祝愿北方交通大学不断地发展、前进，早日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

60年代在母校学习期间回忆片断

宋宪龄

门头沟搞社教，演出“三月三”

1964年的秋天，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的地方是北京郊区门头沟。出发前，我们在大礼堂听院领导作动员报告，传达了中央文件，对下农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提出了要求：社教工作组要学好文件，吃透精神，到农村要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搞好社教，完成任务。临走时，我们每个人都随身带上一本社教工作小册子，以便学习工作用。

我们是背着行李步行去门头沟的。光走山路就是两个多钟头，这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也是个锻炼。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男同学们还为一位华侨同学凑了好几件衣服。我记得我们班分成两个组，分别去一个村子。我们到了上苇甸村后，就分到贫下中农各家住。我们三个女同学住在一家。山区的农民家庭的条件很艰苦，他们怕我们受凉，把炕烧热让我们住，他们平常吃的是棒子面大饼子和野菜糊糊就咸菜，没有其他菜。却把他们那里用来招待客人的最好吃的饅饅压出来给我们吃。我们到村里的第二天，就下地和农民一起干活了。休息时，在地头上为农民宣讲中央文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晚上，除了按工作要求访贫问苦外，我们在房东家的煤油灯下教孩子们学文化。这里的农民吃水很不容易，挑水要到坡下，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一里多地。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挑水走平地还凑合，走山路就摇摇晃晃，费很大劲儿，挑回来水撒得只剩半桶。后来，还是房东家比我们小好几岁的大女儿教会我们的。等我们离开这里时，我们挑水上坡下坡都不成问题了。我们和房东的十五岁的大女儿处得象亲姐妹一样，临走时难舍难分。

刚来到这里,就听村党支部书记说,别看我们村在北京郊区,但是村里的多数老乡没有下过山,这里很闭塞。山区里老乡们的文化生活很差,城里的剧团也不到咱们这穷山沟来。村里有几个戏迷,在外面学了段鬼戏,现在这鬼戏也不让演了,就没有别的看了。你们这些大学生来了,能给我们村里人演一场革命的戏就好了。当时在我们这个村子参加社教的学生,除了铁道学院的同学外,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一部分同学。两家一合计,咱们到这里搞社会主义教育,除了搞好工作外,如果能演场革命的戏,来占领这个村的文化阵地,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班的几个积极分子就行动起来,先找到村里的几个戏迷,请他们一起翻箱倒柜地找戏本。村子里有文化的几家也给我们提供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找到一本“三月三”的戏本。这本子只有词没有曲调,一看内容不错。写的是解放前周洪亮等共产党员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故事。我们同音乐学院的同学商量好,就确定了这个本子。音乐学院的同学是学民乐的,只带有二胡等简单乐器,村子里还有几样锣鼓,伴奏还凑合,他们主动提出担任伴奏,让我们学校的同学出演员,我们班还有几个积极分子,就答应下来了。用什么地方剧种演出,我们两个学校的同学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有的说演京剧,有的说唱黄梅戏,还有的同学说演评剧,七嘴八舌定不下来。最后,还是音乐学院的一位同学出了个点子,那就是看我们学校来的多数同学会唱什么戏,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很快能排练出来。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一摸底,在我们村参加社教的同学当中,有几个会唱评剧的,再说当地河北老乡也都喜欢评剧,当晚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当即成立了由两个学校四、五名同学组成的领导小组。大家说我在学校话剧队培训过,就推我当导演。导一台戏,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为完成社教工作队交给我的任务,我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我用两天的时间熟悉剧本,还编出排练计划,交给领导小组研究通过了。当导演就要选好演员,剧中的角色有地下党员周洪亮、茶馆老板娘、有一叛徒,还有两、三个国民党兵和部分群众。我就同报名参加演出的同学商量,最后确定由刘国苹扮演老板娘,张惠江扮演周洪亮,俞志鹏演叛徒,杨隆骞等三位同学演国民党兵,其余的几位同学演群众。为了加快排练进度,我们把台词抄好,发给每个演员。白天,同学们照样下地劳动,搞好社教宣传,利用中间休息时间背台词。晚上,同学们集中排练。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个“戏班子”里,只有刘国苹和张惠江能唱下来,其余的同学还得教唱。音乐学院伴奏的同学很认真,为了配合排练,他们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为每个演员伴奏排练。有的同学嗓门不高,调上不去,乐队还得降调,真够难为他们的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俞志鹏同学扮演叛徒这个角色,有一段唱词:“周洪亮在眼前,看样子不能行方便”,他提出改为快板道白,效果还不错。经过一周的单个排练,大家的唱词基本能背下来,我们就组织合排。演员中只有少数人上过舞台,顾了唱就不会表情,我和小组的同志们在下面尽力帮助纠正,演员之间也互相提醒,合排了五、六次,基本算过关了。我们这个业余戏班子,剧务工作没有专职人员。服装、道具、布景等工作就由演员们兼任,实在人手不够,就请村里的文艺积极分子来帮忙。我这个导演也是舞台监督,边组织排练,边考虑服装、道具、布景的筹备,由兼职的同学分头去办。服装只有就地取才,村子里的老乡听说我们排戏需要衣服,都主动地借给我们,实在借不到的,就用我们自己的衣服缝缝改改。剧中国国民党兵穿的服装,我们把借来的转业军人的黄军服做了假领章缝在领口上,还改了帽子和帽徽。没有布景,就摆上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就像演京剧那样。剧中用的道具,象“国民党兵”背的枪就是村里民兵用的枪,把子弹卸了;茶馆里的茶壶、茶碗,老乡们都给送来。为此,我们还规定了纪律,不能损坏老乡的东西,用后要“完璧归赵”。所以,大家排练时特别小心,每次排练完有专人保管。经过大家的刻苦排练,积极配合,不到三个星期就进行了采排。那天,我们还化了妆,专门请了村干

部来提意见，整个戏演下来一个多小时。

正式为老乡演出的前几天，我们村里就贴出了海报。演出那天晚上，邻村的老乡听到消息，还跑了好几里地到我们村来看戏。锣鼓还没有敲起来，戏台子下面已围满了好几百人。村里的老戏台子挺简陋，台上没有幕布，点的是汽灯。北方深秋的夜晚，已是很凉了，台上的乐队队员和演员们穿的不多，我真担心他们演下来要感冒。这场戏同学们演的非常认真，在后台提词的同学也没有想到，前台竟没有忘词儿的，而且每个同学的唱段和乐队配合得那么默契。老乡们看得入神，台上演到国民党兵在茶馆里搜查共产党员周洪亮时，台下观众也跟着紧张得鸦雀无声，……。一个半小时总算拿下来了，老乡们给以热烈的掌声。演完后，村里还给演员们加了餐，虽然只有苞米面窝头和粥，可这顿饭大家吃得很香、很热乎。

“三月三”演出后，在村子里震动不小，纷纷要求再演几场，还要求我们到其他村演出。根据社教队的安排，我们在本村又演了两场。我们这个村的社教工作队的声望高了，同老乡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住的那家房东的女儿，梳两根辫子，我们都称她小妹妹。我们每次演出，她都跑前跑后帮我们不少的忙。最后那场演出结束后，还帮我们洗干净借来的衣服，然后挨家送还。邻走时，她还把小学毕业时下山照的像片送给我留个纪念。还说：“别忘了我们山里人啊！”用我的钢笔在照片后面还写上了名字。

几十年过去了，已事过境迁。可是，门头沟上苇甸村那些纯朴勤劳的老乡们、那梳着两根辫子的小妹妹可爱的形象，以及当年“三月三”演出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剧中共产党周洪亮忧国忧民、爱憎分明的一段唱词，至今我还能哼上几句：“三月里来三月三，清明佳节艳阳天。春光无限好，微风拂人面。好时光，为何无人闲游览。看旧坟填新土，新坟插白幡，男女老少衣服烂，凄惨入眼帘。大好的山河被污水染，见此情我心中，怒涛滚滚浪花翻……”。

注：本文一些重要情节的回忆，得到我班同学谢莹、张惠江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食 堂 里 的 大 字 报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同学们都凭粮票定量吃饭，但比几年前填不饱肚子的时候好多了。

有一天吃完午饭，不少同学围在洗碗处，我挤进去看到一张大字报，而洗碗池旁边的台上，放了半个白面馒头和已掰开的窝窝头。刚刚度过挨饿日子的同学们一看就明白，一定是哪个同学吃不完扔掉的。大字报的言词不用说是很激烈的，我记得有这么几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丢掉的不只是一个馒头和窝头，而是劳动人民勤俭的品德，艰苦奋斗的精神啊！”在场的同学都很气愤，还有人在上面签上字，同意这张大字报的观点。

几天内，这件事在同学中成为热点。我们班还为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在的校友可能会感到这是小题大作，可那件事能有这么大的反响，不仅仅是因为同学们刚度过灾荒年珍惜粮食，也同那个年代学校对学生的艰苦朴素、奋发图强的教育分不开。一直到“文革”前，在学校西食堂里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宿舍楼的卫生被同学们“承包”了

1995年10月,我参加中国铁道学会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学术论文评审。很凑巧,评审安排在北方交大,使我有机会回到母校。早晨,我象29年前读书时那样,到操场上锻炼身体。当我慢跑到九号宿舍楼前,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两层的宿舍楼早已破旧,但这宿舍楼使我倍感亲切。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六个春秋。

我们这个九号宿舍楼,当时住多少学生已记不清了。当时,我们财会班有八个女同学住在一楼朝北的第一间。房间里分上下铺,还有四个女同学住在斜对门的房间。那时,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早晨要集体跑步、出操,还有早自习,下午四点以后是课外活动,晚间还有晚自习,一般要到二十一点。但教室、宿舍楼里的洗脸间、厕所、走廊的卫生却全由同学们“承包”了,每层楼在洗脸间贴有卫生值日安排,大家都自觉轮流按时打扫。每个宿舍里的卫生也有安排,每周还有室外突击卫生活动。那时,同学们干习惯了,没有感到是个负担。再说都有一个集体荣誉感,哪个宿舍也不甘落后,干起活来都争先恐后,不管是打开水、扫地,如果自己没有抢到手,心里很不舒服。就连我们每年九月份开学后的一个月的军训练兵,尽管比较劳累,也照样如此。劳动光荣,劳动是一种美德,在同学们当中已蔚然成风。至于自己洗衣服、补衣袜、拆洗被褥都是那个时代青年学生们引以自豪的本事,当然不排斥同学们之间的互相帮助。

自强、自立、勤奋、爱劳动和有集体荣誉感,在生活中已潜移默化成为那一代青年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伴随着他们走向生活,走向未来。

跟时传祥师傅一起劳动

每当我看到刘少奇主席当年接见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师傅的照片时,就会想起1964年我们班的同学跟时传祥师傅背粪桶,参加劳动的事儿。

1963年以后,在校园里掀起了学雷锋、学英雄、学先进的热潮。那时候,报上刊登了全国劳模时传祥的事迹,我们真想见见时传祥师傅,更想知道时传祥师傅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事迹。

我记得是1964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按报上报导的环卫所地点,我班几个同学一同前往,当时有陈德、刘玉英等。当我们到环卫所说明来意后,才知道时师傅干活去了。所里的同志见我们这些大学生是真心实意来学习的,就告诉我们时师傅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作报告,跟他干活就会了解他这个人。我们只从报上知道他干的活又脏又累,可当我们和师傅一块儿干活后,才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带我们去找时师傅的同志和我们三拐两拐来到一个胡同口,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一位老师傅正带着徒弟抱着粪桶往粪车里倒粪水,还没走到跟前,臭味就挺呛人。我当时想,来都来了,还是跟师傅干了再说。时师傅个子挺高,脸色黑里透红,穿着一身退色的工作服,见了我们非常高兴。他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对我们说:“你们是第三拨大学生来参加劳动体验生活的,欢迎欢迎!”边说边教我们干活。那时的大学生参加劳动还比较多,可没干过这活。环卫工人的工作条件差,又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尤其是北京原来的老胡同住宅,多数

没有抽水马桶，各户各院门又小，车子进不去，只有用简单的劳动工具——粪桶（大概有70公分高的木桶，上口是敞开的），将粪便掏在粪桶里，从各院背出来，再倒在粪车里。时师傅把粪桶帮我背在背上时，我觉得起码有几十斤重，师傅早把他的垫肩放在我的肩上，怕我吃不消。休息时，他给我们讲了在旧社会当掏粪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还要受粪霸的气。他激动地对我们说：“新社会我们当家作了主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掏粪工还能和国家主席握手。现在，党和人民关心我们环卫工人，不断地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这些原始工具很快就要淘汰了……。”

我们劳动了大半天，穿的衣服弄脏了，肩膀也痛了，可想到时师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不怕脏、不怕臭、不怕累地干活，为的是千家万户的干干净净，他们的灵魂是最美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干哪一行都是为人民服务，少了那一行都不行。

几十年过去了，城市里的环卫工人早已甩掉了粪桶，换上了现代化的设备。当我看到被人们称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人们辛勤劳动时，就会想起同时传祥师傅一起劳动的情景。

最后的实习

我们班在校期间，实习劳动可算最多的了。外班的同学都羡慕我们去的地方多，见多识广。四年当中，我们先后到丰台、天津、阜新、济南机务段，青岛车辆段实习劳动。老师常对我们说，财会专业的同学必须了解铁路基层站段的生产过程、材料定额和消耗等，才能学会当家理财的本事。而机务段的材料核算是最复杂的，机务段、车辆段的财务能干下来，其它站段没有多大问题了。所以，大学几年，除在校学习外，实习劳动基本是在机务段、车辆段。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个半月，每次实习劳动对我们来说都有较大的收获。不仅能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同生产实际相结合，以达到学以致用，而且在同现场工人的一起劳动中，培养了我们热爱劳动的思想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每次实习劳动都有许多值得回忆的故事。而在济南机务段的最后一次实习劳动，时间最长，收获最大，最令我难忘。

（一）当好助手

那是1966年4月，经济系安排两个毕业班的部分同学，共十几个人。到济南铁路局进行毕业实习，这也是我们在校的最后一次实习。当时，毕业班的大部分同学到兰州局搞社教，系里的多数老师也一同参加。带我们实习的是杨爱芬、吕慎有两位老师，他们除了到路局和基层站段联系实习工作外，还要负责指导我们的毕业作业。那次实习的同学有刘宝华、白文、王申庆、富立滨、王梁（王延芳）、郭天照、霍庆民等。当时专门成立了临时团支部，我任团支部书记，刘宝华、白文为支部委员，协助老师作好实习队同学的实习、思想和生活等工作。我们十几个同学由老师安排到几个基层站段，我和富立滨、霍庆民同学分到济南机务段财务室实习。我们实习队的同学住在济南局办公楼地下室的两个房间，这对我们学生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了。白天大家各奔单位实习，晚上回来还能互相交流。两位老师安排好我们的实习和生活后，专门召开了全队同学的会议，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尽管在济南铁路局只有你们十几个同学，但是人家看到的是北京铁道学院的学生，要虚心向师傅们学习，注意遵守单位纪律，积极参加实习劳动，还要确

保安全，平时注意收集资料，实习结束要完成毕业作业，离开这里时给各单位留个好印象。老师在实习期间还分别到各站段了解我们的实习情况，并根据实习情况指导我们十多个学生的毕业作业的内容，他们是很辛苦的，临时团支部就要当好两位老师的助手。我们三位支委在实习、劳动、生活中注意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不但要在各自的单位搞好自己的实习劳动，更重要的是团结同学完成我们的实习任务。所以，每天回来就是再累，我们都要碰个头儿，了解一下同学们在各单位实习情况、还有什么困难等。遇到同学之间有什么小摩擦，我们还要及时谈谈心，帮助解开疙瘩。为此，我们牺牲了不少休息时间。在两个多月的实习中，同学们认真学习，互相帮助，不仅完成了实习任务和毕业作业（毕业论文初稿）、增长了知识、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而且在实践中也增强了我们的才干。

（二）少一分钱也不行

我们实习所在的机务段财务室有六、七位师傅，都是中年人。财务室主任也有五十来岁，戴副眼镜，说起话来慢声慢语，但他办事挺认真。机务段的财务工作很忙，但他对我们的实习计划安排得很细，三个同学各有侧重，但都要全面实习。所以，我们一开始实习变同师傅一道，从材料室的领料、填写材料小票、记帐到财务室内的材料核算、工资核算、出纳以及财务决算报告等，都让我们过一遍。实习中间还让师傅带我们去泰安机务折返段量煤，以便使我们尽快掌握燃料的保管和计算。主任跟我们说，你们这样全面实习，自己动手干，毕业后到基层单位就能独立完成财务工作。

过去实习以参加劳动为主，这次实习是全面熟习财务业务。尽管在学校我们系统地学习了铁路财务方面的理论知识，但要在现场实际操作，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财务室的师傅们不但手把手地教我们业务知识，让我们学会具体操作，而且还言传身教，让我们懂得财务人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

大概是五月中旬，正赶上段里发工资。我们除了造工资单外（那时还没有上微机，全部手抄），还同师傅们去银行取现金、点钞、分发工资。那天，我们三个同学同师傅在银行清点好工资款，取回来后按工资单将钱分好，一个一个装在每个职工的工资袋中。这个段那时就有职工1500多人，财务室6、7位师傅一个不漏，加上我们实习的同学，分的分，装的装，还是忙活了一天。还有两个小时下班，钱分完了，不凑巧少了一分钱。大家又一袋一袋地清了一遍，就是没有找到这一分钱。我当时跟师傅说，就一分钱，找不到咱们垫上算了。可主任说，搞我们财务工作的就要公私分明，如果这一分钱没找到而自己垫上是我们工作的失误。看来，少一分钱也不行。我们又分头找，桌子上面椅子底下找个遍，还是师傅们心细，硬是在两张桌子的夹缝中找到这一分钱。这一分硬币装到工资袋后，已是下班一个多小时了。我们几个同学为师傅们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实习中的这个小故事，事隔30年了，印象还挺深。

（三）参加修建符夹线劳动

我们那次实习，正赶上济南铁路局符夹铁路大会战。那时，修这条线除一部分专业队伍外，铁路局的干部、工人要参加义务劳动。我们所在的机务段还是义务劳动的主力，我们实习队的同学积极报名参加。我们这个临时团支部还给大家专门开了个会，对团员专门提了要求：带头

参加修新线的劳动，不怕苦、不怕累，使实习、劳动双丰收。

我们那次参加修符夹线劳动(符离集—夹河寨)，主要任务是打夯和铺好路基。工地上的总指挥看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又喜欢唱歌，就把编夯歌的任务交给我了。说实在的，劳动中间休息时组织大家唱两个歌，打个拍子还凑合，要说编夯歌可是头一次。这个任务怎么也没有推出去，硬着头皮接下来。夯歌不同进行曲，非在打夯的劳动过程中根据拍节才能编出来。我们这段工地全是铁路局机关和基层站段的干部和工人，会打夯的极少。现在的中年人，一定还会记得电影《锦上添花》里小车站上编抬木头号子出洋象的那个年轻人吧，我真怕编出不伦不类的夯歌闹出笑话，就和师傅专门跑到其它工地，同筑路民工一起学打夯。从他们喊的简单的打夯号子中，体会到编夯歌的拍节。劳动半天跟着喊号声学会了打夯，当时没感觉怎样累，晚上回来睡上一宿，第二天胳膊酸痛得抬不起来。不过年轻人干劲大，好强也能吃苦，照样上工地干活。我和师傅边打夯边编词，试着唱起来。我还记得那么几句：“同志们那么嗨嘿！加油干那么嗨嘿！不怕苦和累那么嗨嘿！修通符夹线那么嗨嘿！”。当时我用1958年在东北农村抗旱打水劳动时同农民学的劳动号子的曲子填的词。休息时，我就编写好，下午就示范给各小组，一下子就成功了。我带头先唱：“同志们那么”，大家随唱：“嗨嘿！”，夯石就一起抬起来落下，虽然夯词比较简单，但同打夯节奏很合拍，大家动作整齐，步调一致，边唱边夯也不觉得累了。这个夯歌很快推广到其它段工地的打夯组。为了教会其他段的打夯小组，有几天嗓子都嘶哑了，但心里真高兴。那次是吕慎有老师带领我们参加修建铁路劳动，短短半个月的劳动，使我们锻炼了意志，又学到了修建铁路的知识，也算我们这次实习的意外收获。从符夹线返回时，为了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吕老师还特意组织我们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后，我们全体师生还在纪念馆门前照了像，这张黑白合影照片成为我们那次实习的永久纪念。以后，当全国铁路示意图填上符离集—夹河寨这段铁路线路时，我们参加修建劳动的同学们都感到能为这条铁路线的建设出力流汗而自豪。

谁也没有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突然，那次实习没有完，就接到学校的通知，提前结束毕业实习。我写的《铁路基层站段的材料核算》的论文草稿打好了，还没来得及请杨爱芬老师指导，修改，6月2日就提前返校，卷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

在母校过春节

程训诂

我们都爱把祖国比作母亲，那是无可非议的。我认为母校，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比作母亲。你看她那广阔的胸怀，丰富的知识，为人民铁路培育了千千万万有用的人才，这些人才不能算作她的儿女吗？

“每逢佳节倍思亲”。既然母校可以比作母亲，在1996年新春佳节之际，在大年除夕之夜，不由人想起1951年在李阁老胡同旧校址，在母亲身边渡过的一个快乐、温馨、愉快、令人难以忘怀的春节。

春节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个大节。她象征着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好日

子。很多人在万里之外，为了赶上这一天，不辞劳苦，千里迢迢赶回家过年。我们这群因种种原因，不能回原籍和家人团聚的学生，正感慨万千，正孤独寂寞，母校伸出温暖的手，把我们组织起来。党团组织给我们送来无限关怀，使我们忘记了“身在异乡为异客”之苦，沉溺於舒适、欢乐之中。事隔45年了，当时的欢乐情况记忆犹新，兹将其中几个片断回忆如下：

一、新礼堂文娱晚会：

1950年9月，在原图书馆对面，动工新盖了一幢大礼堂。春节前正好完工。除夕之夜，院方为了活跃大家的文娱生活，减少思乡之苦，就在这新落成的大礼堂内，召开了1951年春节文娱晚会。晚会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有歌曲、舞蹈、相声、快板……。各系、班纷纷争出节目，掌声此起彼伏，会场情绪高昂。大会一直开到晚11点左右，会后又放了两场苏联电影，我记得一部是《青年近卫军》，一部是《列宁在十月》。电影完了又跳集体舞，整整玩了一个通宵。大家沉醉在欢乐之中，根本忘掉了在母校过节，真是“直把母校当故乡”了。

二、按系、班包饺子

大年初一吃饺子，是我国民间的一个古老风俗，当然学院也不例外，由学校食堂按各系、班人数分发饺馅和面粉，男同学擀饺皮、女同学包饺子，然后送到食堂去煮，大家团聚在食堂里吃饺子，有说有笑，欢声一片。有的女同学别开生面，包出各种形状的小动物饺子：有小猫、小鸡、小兔子、孔雀……等等，大家一边吃着，一边夸奖、赞叹她们的心灵手巧。特别是家在南方的同学更感兴趣，因他们很少吃饺子（按南方习惯，年初一吃年糕）。对这次少有的“饺子宴”赞不绝口。

三、师生团拜会

刚吃完饺子，院广播喇叭便响了。“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院长和教授们给大家来拜年了！请大家马上到大礼堂去！”同学们听到广播，搁下碗筷，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大礼堂，。这时，以刘炽晶院长为首的教授们已端坐在主席台上了。据我的记忆，有运输系的林达美；电信系的钮泽铨、田成文；经济系的张协衷、许延英、朱广心、殷宗鸷；政治教研室赵锐、茅广祯……等等。他们在台上频频招手，向同学们致意，刘院长还在大会上讲了话，祝贺同学们新春快乐，以校为家，吃好、玩好、休息好，以饱满的精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语重心长，给大家很大鼓舞。

四、同学互拜年

师生团拜会结束后，男女同学们趁热打铁，又进行了“到宿舍拜年”的活动，在50年代，男女同学之间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男女授受不亲”的“鸿沟”，宿舍之间很少来往，趁过年之际，互相到宿舍进行“拜年”和“参观”，也是一大乐趣。我们“会专班”主要到本班女同学朱怡濂、徐敏、周织云、夏胜华（已故）等宿舍参观。她们也到我们男生宿舍来看看坐坐。双方各备了一些茶点，像招待“贵客”一样。平常在班上天天见面，有时为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同学。这时倒客气了起来；彼此让坐，倒茶递水，但未过几分钟又说笑打闹起来了。各宿舍内笑声不断，真正显示了春节气氛。

五、全市通用游园票

除夕之夜玩了一通宵，年初一吃完饺子，又团拜、互拜了年，大家确实有些疲倦了。到底我们是青年人，睡了一宿精神又焕发了。年初二，院方给每人发了一张“全市通用游园票”，可以到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动物园、颐和园等处凭票游览。食堂给准备了食品，大家带上，三五

成群的出发了，到各人愿意去的地方去玩。有的同学还带了照相机，顺便拍了不少雪景。总务科还特别给增开了浴池，回来洗了一个痛快澡，消除了一天的疲劳，晚上躺在床上，各述所见，谈笑风生，在愉快欢乐中入睡了。

总之，1951年的春节是一个愉快的春节，温馨的春节，终生难忘的春节，事隔45年了，那欢乐的笑声还在耳边回响呢！

怀念杨增祥同志

王维国

杨增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是北方交通大学原总务处副处长，离休后享受局级待遇。于今年3月23日夜因心脏病突发在家逝世，享年73岁。

杨增祥同志1923年2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市，从小学徒，是工人出身的干部。

杨增祥同志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提拔到领导岗位，对社会主义怀有深厚感情，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53年我在学校做总务工作，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杨增祥同志领导下从事总务管理工作。回想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几十年间，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热爱总务服务管理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杨增祥同志革命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总务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他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保持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六、七十年代学校各类汽车都比较旧、经常坏，供暖锅炉也经常出故障，为保证教学和生活正常需要，他带头爬到车底下、锅炉里和修理工一齐抢修，保证了用车和正常供暖。

在长期从事总务服务工作中，他总是强调把为教学科研、师生员工服务放在突出位置。

为了保证寒暑假新生报到和旧生返校，有很多工作需要加班加点，他关心职工生活，自己主动掏钱为大家买吃的，群众很受感动。在总务工作后期，他身患腰脊椎尖盘突出症，行动困难，但他仍然顽强的坚持工作，说“小车不倒往前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60年代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粮食供应紧张，有一位老工人家里粮食不够，他把家里半袋面直接送到这位工人家里，老工人感动的说：“还是我们杨处长体贴我们、关心我们。”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深受总务部门广大职工爱戴和拥护。他的一言一行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学习他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为了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在生前早向子女留下遗言，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不开遗体告别会。

杨增祥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但他那种献身精神，使我终身难忘，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学习。